

# 习近平光辉的文艺思想

巴厘：意如香

续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新时期，对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近来中国文艺界，冒出了“饭圈”乱象，一些所谓的教授、学者、作家，极力诋毁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发表了一些不符事实、抹黑中国的作品，如《软埋》、《方方日记》等，给西方反华政客“递刀子”，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这些“无知”成为众矢之的，无地自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快人心。

中国文联与作协也不断清理队伍，严肃对待中国文艺界，因受资本操控出现的乱象，

积极拨乱反正严加整治，如今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出重手发声，讲话震耳发聩，是针对文化艺术界的一次重磅警醒忠告。习近平指出：“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习近平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

- 第一、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弘气象；
- 第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 第三、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 第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第五、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

习近平的光辉文艺思想，有许多值得我们印华文坛借鉴学习的经典金句，对我们印华文友在创作作品中，是值得参照学习的成就人生价值的辉煌思想引领。习近平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流，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义，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作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茅盾说：“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习近平认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

放歌。

习近平认为：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要发扬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上更加充盈起来。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内容选材要严，思想开掘要深，艺术创造要精，不断提升文艺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习近平说：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谦敬之心，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

习近平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作的宝藏。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固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认为：以文化人，更能凝聚心灵，以艺通心，更能沟通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中华文化形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青名。如果只想走捷径，求速成，逐虚名，幻想一夜成名，追逐一夜暴富，最终只能是过眼云烟。文艺要通俗，但绝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绝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

西。文艺要效益，但绝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创作要靠心血，形象要靠塑造，效益要靠品质，名声要靠德艺。低格调搞笑，无底线放纵，博眼球的娱乐，不知止的欲望，对文艺百害而无一利。

习近平上述这些光辉的文艺思想，不但对广大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有着警示明心的教育作用，放之海外，对我们印华文友，同样是一剂苦口良药，对提高文友们的素质涵养，以及端正写作作风，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这对印华文坛里的文化团体，如作协、文协以及华文报的副刊、杂志期刊的编委，正是一剂印华文坛选用培养文学接班人的良方妙药，敢于放手重用人才，不妒才，不忌才，才能成就文坛大业。让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的光辉文艺思想，结合印华文坛的实际情况，活学活用，深信必将获益匪浅。

## 国会应尽快通过《资产没收法案》

本报评论员：余凡



今年3月中旬，政法及安全统筹部长马福特(Mahfud MD)揭发在财政部系统发现300兆盾疑是洗钱活动的汇款后，他与财政部部长接连几次参加国会第三委员会的听证会。

在3月29日举行的会议上，马福特部长向第三委员会表明，政府于2020年把重修的《资产没收草案》递交给国会，但突然从“国家立法计划”(Prolegnas)的优先项目中被抽出。其实草案内容已经获得前任国会议员的认可，政府再稍作整理后就呈交国会进行审议通过。”为此，他要求第三委员会主席庞邦(Bambang Wuryanto)协助推动《资产没收草案》及《货币交易限制草案》的尽快立法，以便政府打击影响严重的贪污案件。

对于马福特部长的催促，庞邦毫不避讳地表示，议员们不敢在《资产没收草案》上签字，这必须先由各自党派的总主席点头才行。“我说句坦白话，草案可能顺利签署，但需先与各位党魁们磋商协调，单在这里议论肯定行不通。”其他议员们也笑着表示默认。

《时代网》(Tempo.Com)于30日报道，肃贪局局长(Firdi Bahuri)在与国会第三委员会(Komis III)于雅加达史纳延国会议事厅交流时，恳请国会尽快决议通过《资产没收法案》以及一些与肃贪有关的宪法，支持政府更有效、彻底地打击屡禁不止的贪污舞弊。

《点滴网》(detik.Com)于14

日消息，马福特表明《草案》已由数名部长及机构领导签名表示同意，不久将呈送到国会审议。“我们刚结束讨论《资产没收草案》更具技术性的内容。”他透露说，佐科维总统也建议巩固有关草案的资料。“等数天后总统出访外国回来，我们可以即时呈上，所以，在政府内部已经没有疑问，希望一切能顺利进行。”

《罗盘网》(KOMPAS.com)于14日报道，佐科维总统周四在德博(Depok)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持续推动，以便《资产没收草案》尽快立法，这宪法十分重要。”总统认为该草案的讨论耗费了很多时间，而在制裁和打击贪污弊案时，亟需相关宪法作为依据。

之前，总统也已就《资产没收草案》表达看法。首先，2月7日在独立宫的记者会上，总统已明确要求上述草案能尽快在国会立法通过。“我催促《资产没收草案》可以立法，而《货币交易限制草案》能开始进入议程。”接着，在4月5日的讲话中，总统又声明《资产没收草案》是政府的建议，“该草案的确是政府的倡议，所以我们积极推动国会加快的议事程序。目前已经开始审议了。”“我希望《资产没收法案》有助于相关案件的处理，尤其是对贪污案被法院判决有罪时，对相关案犯的资产没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有关刑事犯的《资产没收草案》于去年12月15日作为政府的提案，已列入国会的2023年议事要点。2021年，财务交易监管局(PPATK)已要求该草案能尽快在国会立法，因为关系到总统在“五年计划”的9项“建设重点”(Nawacita)中对廉政反腐的承诺。

回顾历史，上述两款宪法草案(RUU)在佐科维总统

2014-2019年的“建设重点”中以及2020-2024年国家中期建设计划中向全国人民所承诺的。在“建设重点”(Nawacita)的第4条写道：“拒绝让国家软弱地进行改革，并确立反贪、可信及凝重的法律规则。”

印尼腐败观察(ICW)研究员拉罗刺(Lalola Easter)于4月3日在其官方YouTube平台认为，因为有部分“权势团伙”对肃贪局“现场抓捕行动”(OTT)深感不满，影响到《资产没收草案》难于在国会顺利通过，这可以从第三委员会主席庞邦对马福特部长的回答内容中看出端倪。其实，国会的这种现象民众早有所闻，奈何无能为力。诚然，《资产没收法案》应能成为印尼遏制经济犯罪及贪污枉法的“杀手锏”，祈愿国会可以决议通过。

何况，至今尚不具有有效应付贪污刑事案犯的法律规范(regulasi)，“如果在监禁体罚方面难于着重(heavy)讨论贪污刑法，当然应该加大在《资产没收草案》方面的打击力度，其首要步骤就是推动《资产没收草案》的立法通过。”立法不严必将导致纪律败坏！

拉罗刺认为，印尼在打击及整治经济罪犯方面还显得左右支拙，这可以从2021年度的判决趋势(trenvonis)一窥全豹。据ICW的记录，2021年共有1403宗经济罪案被告上法院，但仅有12人被判违反洗钱刑事法(TPPU)的相关宪法，大多数案犯得到“从轻发落”。

不少专家也表示，各党政要显然对《资产没收草案》及《货币交易限制草案》的议程不太关注，其中原委可谓“一言难尽”。不过，这次经过马福特部长的“火力四射”，佐科维总统的婉言催促，希望国会议员打起精神，尽快审议通过这两款“反腐”的《草案》。

## 东西半球“老朋友”这样开辟新未来

国际锐评

“中巴领导人创造历史”“卢拉的中国之行行为巴西打开机遇之门”“与习主席会谈后，卢拉总统的行李箱装满各种双边协议和合作计划”……对于巴西总统卢拉15日结束的访华之旅，巴西媒体和各界给予积极评价。大家普遍认为，中巴两国元首为下一阶段双边合作明确了方向，引领两国关系开创新未来。

今年是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点，卢拉总统12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从中巴元首会谈成果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看，卢拉此次访华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卢拉总统说，全面加强对华关系是巴西立法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强烈愿望。

中国与巴西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交往由来已久。两百多年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千山万水赴巴西种茶授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巴于1974年8月15日正式建交，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卢拉总统四次来华访问，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巴各自面临着发展任务。中国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巴西正在推

动“再工业化”进程，致力于解决脱贫等问题。新的形势下，中巴这对跨越重洋的老朋友，如何开创新未来？

在14日的会谈中，习主席席三个“坚定”阐述了中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卢拉总统表示希望中巴关系能够超越贸易领域。两国元首不约而同用“战略高度”一词来看待双边关系。这表明，双方政治互信水平达到新高度，新时代中巴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卢拉在访华前后接受采访时，对中国式现代化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巴西目前正致力于打造一条“巴西现代化之路”。中方表示愿积极探讨共建“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业化”战略对接，双方签署了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这意味着，中巴正不断拓宽双边合作领域。

从卢拉此次访华行程看，巴方希望扩展对华新领域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他在上海参观了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研究中心，会见了中国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负责人。从低碳经济、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到航空航天，中巴双方正在高科技领域开拓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巴关系发展超越了双边范畴，对完善全球治理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为什么这些国家都必须以美元结算？为什么不能是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13日，卢拉在上海出席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的就职典礼

时一番话，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当前，某些发达国家极力推动“逆全球化”，鼓吹“脱钩断链”，给全球经济复苏制造了很大困难。为抑制本国通胀，美国连续激进加息，负面效应不断外溢，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后者联合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底，巴西政府表示，巴西已与中国达成协议，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根据此次中巴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深化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加强本币贸易，推动可持续融资领域合作等。分析人士指出，这将促进中巴贸易投资便利化，也有利于稳定全球贸易投资。

除此之外，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中巴两国一直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战略合作。本次中巴元首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这被外界认为是中巴联合发出了宝贵的和平呼声。

在拉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是部经典作品，讲述了拉美国家如何被西方霸权收割，巴西就是其中之一。要和平、要发展、要现代化，这是巴西人民的心愿，也是中国人民的心愿。相信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新时代中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中拉合作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活力。这就不难理解，卢拉总统为何坚定地表示：“没有人能够阻止巴西不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林绍良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华人有经商头脑和生意经验，在房地产行业也需要有创新概念，但他们不是天生就是地主，而房地产却需要大量的土地。控制土地并非易事。房地产的业务需要各联系，除了与土地拥有者人沟通，还要与当权者联系。他们需

要政府发布某种用于发展房地产业的土地政策。于是房地产业与掌权者就建立密切联系。华人房地产企业如何与该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如何能成功地跨越时代，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

### 土地使用证和房地产的出现

可以说，印尼的房地产历史始于1972年，当时政府发行了两种形式的许可证，向开发商开放土地。第一种，土地使用许可证(Surat Ijin Penunjukan Penggunaan Tanah, 简称 SIPPT)——后来称之为土地使用证 Izin Lokasi)——赋予房地产开发商根据城市空间规划获得土地并建造所需房屋的权力。第二种，主要建筑物使用权(Hak Cuna Bangunan Induk), 即授予开发商30年土地使用权(该规定不起作用，因为实际上准证可以延长，在此期间，土地可以转换为产权。这两份许可证构成了房地产部门运作的基础，也是有效

## 房地产的发展 (3)

阿比丁·库斯诺 (ABIDIN KUSNO)

降低(或消除)遵循“土地的社会功能”的1960年《土地法》的权力基础。

发展房地产业的目标与新秩序时期希望在城市和国家发展中依靠私人资本的战略有关。政府协助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发放土地使用证，后来在1989年实现银行自由化)建造大量住房。这项政策与新秩序的使命有关，即目的是将雅加达的形象从“大村庄”转变为“大都市”。如果可以将大量居民迁移到仍然有大片土地的城市郊区，这是可行的。

正如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土地使用证和一系列放松管制(包括银行)对房地产业产生巨大影响。1996年，苏哈托政权后期，国家土地局(Badan

Pertanahan Negara, 简称 BPN)指出，雅加达附近房屋建筑业已获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共计121,000公顷，银行贷款总额达到37.1万亿盾(见 Cowherd, 2002: 282-283; Leaf, 1991:80-81)。显然，通过土地使用证过多使用土地是不正确的，因为开发商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内使用土地。土地积压显然是开发商针对未来扩张需求而制定的土地储备策略，因为即使获得土地使用证，大部分土地仍未获征用。苏哈托政权后期，国家土地局只发出停止发放土地使用证的指示，但是房地产企业家手中(Simanungkalit, 2008:88-89)，特别是能够与当局建立联系网络的房地产企业家已经掌握大量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业蓬

勃发展。它是代表新秩序时期政府的商业和政治网络的一部分。苏哈托身边关系密切的人从房地产业的发展中获益不少。最突出的例子是班邦

(Bambang Trihatmodjo)(苏哈托的儿子)与格斯特多集团(Kest-edo)拥有者郭瑞登(Kwee Swie Teng)的合作，后者获得30,000公顷的土地使用证，在钟果(Jonggol)建设新城。该项目可能导致茂物和展玉(Cianjur)地区三个乡镇的24个村庄迁移，但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该项目才停工(Tempo Interaktif, edisi 39/01, 21 November 1996; Properti Indonesia, Oktober 2011)。钟果(Jonggol)的计划目前仍不明朗。

尽管生意和政治总是密不可分，但总体而言，华人房地产商希望表现出独立性和专业性。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要完全摆脱权力网络仍然不易，特别是当他们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

大的时候。正是在这样一个寡头的环境下，几位华人大型开发商得以营业和发展。

### 企业家和掌权者

房地产企业家并非都像郭瑞登一样都是土地投机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正的开发商，他们建造房屋目的是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并改善居住环境。像徐振焕和梁世楨这样的大发展商参与土地储备，尽管其目的是开发具有改善环境和协助城市发展愿景的地区。在房地产领域他们是敏捷进取的企业家，并持续努力表现出专业水平。即使这样，土地和资金事务也使房地产行业与权力网络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新秩序时代。例如，当林绍良开始支持徐振焕的业务时，徐振焕的房地产业务才刚刚起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